

一、风乍起：“第三波”的由来

回顾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世纪的历史进程是由以下几股汹涌澎湃的浪潮所推动的。这就是：工业化浪潮、科技革命浪潮、社会主义浪潮、民族主义浪潮和民主化浪潮。

“第三波”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

（一）1974 年里斯本政变的“多米诺效应”

1. 南部欧洲的民主——“第三波”的源头

根据亨廷顿的看法，“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序幕天做巧合地在南部欧洲葡萄牙的里斯本揭开。

1974 年 4 月 25 日，午夜零点刚过的时候，里斯本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的歌曲。播这支歌曲并非偶然，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军事政变的行动讯号。这次政变是由葡萄牙军队的青年军官们筹划的。这场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除了同保安部队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很快，发动政变的军队就占领了主要的政府部门、广播电台、邮局、机场和电话局。到上午时分，政变基本成功。政变得到人民的支持，在里斯本的大街上，兴奋的人群欢呼如潮，把康乃馨花插在起义士兵的枪筒中。傍晚，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坦（Marcello Caetano）向新军事领导人投降，次日出逃。于是，自 1926 年以来的独裁政治宣

告寿终正寝。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发生政变，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74年葡萄牙的政变无意中却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民主运动的开端。政变完成后，当时的葡萄牙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在政变后的18个月中，葡萄牙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保守派、温和派和马克思主义派等派别。在此基础上，上述各派别也建立了各自的政党，从持左翼路线的共产党到右翼的法西斯团体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相继更迭，政府所拥有的权威日益减少。政变与反政变的企图都屡见不鲜。工人、农民们举行罢工、游行，夺取工厂、农场和新闻媒介。右翼政党在1975年政变一周年的全国性选举中赢得了胜利，但左翼政党也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按照西方政治观察家的看法，1975年极可能在保守的北方与激进的南方之间爆发内战。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描写道，当时的葡萄牙在许多方面，“与1917年的俄国极其相似”。^①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葡萄牙社会的政治发展趋势与俄国的二月革命后的情况是不同的。1974年9月，右翼军事领袖安东尼奥·拉马罗·伊恩斯镇压了军队中的激进左翼分子，使马里奥·苏亚雷斯当上总理和总统，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在葡萄牙最终确立。与此同时，在同属于南欧的西班牙，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在当时的总理卡洛斯·阿里亚斯领导下也在悄悄地进行。随着佛朗哥的死亡，独裁政权终于结束。在希腊，由于社会矛盾的结果，以那群为代表的军事独裁政权也最终在1974年垮台，并在年底产生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2. 在“第三波”影响下的世界民主化浪潮

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独裁政权相继垮台，在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相当一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些国家的示范效应。在以上几个国家民主化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蔓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在这些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军人政权不是还政于民；就是原有的军人独裁政权相继下台。到20世纪80年代末，拉丁美洲大陆已基本实现了民主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等原有的独裁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种资本主义民主化的思潮又迅速影响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一批国家建立了具有半西方民主色彩的政治制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多党制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强烈地震撼着以往的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不到几年时间，欧美的多党制民主就在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站稳了脚跟。在资本主义民主取得进展的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有了长足发展。

除了上述的变化之外，原有的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进一步进行了深化民主的改革，还有一些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权威主义”的国家实行了“自由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结果是涌现出一批“准民主”、“半民主”或“软权威主义”的政权。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20余年中，实现了向民主过渡或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国家遍及全球。“从地域上，它涉及到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高原之邦的尼泊尔，也包括热带非洲国家；从文化类型上，世界各种文化如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拉丁美洲）、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发展水平上，它囊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批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在这股浪潮中，经济成功带来民主，经济失败和危机也导致民主；和平改革叩开了民主的大门，高压政策也为民主催生；甚至一些偶发事件都成为转向民主的契机。总之，几乎所有的政治变动都指向民主，各种权威主义政体都以民

主为归宿。”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政治进程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客观地展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都在总体上向前进展。尽管以后还会有一些国家出现反民主化的回潮，但民主化毕竟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历史发展的趋向充分表明，随着人类经济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平等、独立、民主和自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意识日益增强，这必然推动着民主的发展。民主化的出现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民主是一个同独裁相对立的范畴。独裁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进行决定的机制，毫无疑问，这种机制是反动和落后的。民主与之恰恰相反，民主是由多数人进行决定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进步和先进的。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民主总是通行着按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决定的原则；总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法律加以确认和保证。因此，民主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社会中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决定的机制。民主使国家权力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国家权力只是公民权利的代表。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但它是缺陷较少的制度；民主不见得最有效率，但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民主制度也会犯错误，但它具有较好的内在纠错机制，从而使它不容易犯最严重的错误。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现。迄今为止，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明都表现为该国家与该民族的民主政治进程。民主是当代人类政治活动的最佳表现形式，相对于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专政，它毫无疑问是人类政治活动形式的进步体现。总之，民主制度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理想的制度设计。正因如此，民主的出现和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的强劲动力。

（二）亨廷顿理论观点的重大变化

20世纪晚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进程的突飞猛进，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也激发了西方社会一些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兴趣。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就是西方政治思想家理论研究集大成之著。但亨廷顿的转变，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的。

1. 亨廷顿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保守主义观点

众所周知，亨廷顿曾经是著名的新权威主义者，正是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变化中社会的秩序》这部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采取了悲观主义的态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 20 多年间，随着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和世界历史走向进步的影响，一大批先前的殖民地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而独立，涌入了现代化的潮流。在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原有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使得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异常艰难。这种情况引起西方一些学者的关注，纷纷对此展开研究。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前一种理论把世界各国分为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两大类。按照这种理论，早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如英、美等是现代化国家，体现了现代文明；而新独立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仍属传统国家，不具备现代性。传统国家经过发展和阵痛，逐步引进和采纳现代性的全部价值标准，摈弃并排除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从而过渡到现代社会，正如早期现代化国家在 18、19 世纪曾经经历过的那样。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是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后一种理论则认为，传统是许多新兴国家的国情。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样的，传统固然有顽固的一面，阻碍现代化的发展；但传统也有能吸收和容纳新的事物，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的一面。不能也不可能简单地消灭传统，只能借

助它们来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从而最终导致现代化。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瑟夫·古斯菲尔德、莱因哈德·班迪克斯和 S.N. 艾森施达德等。尽管这两种理论主张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首先都是把西方多元化的民主模式当成人人类各民族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化的惟一政治发展道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当成世界各国的样板。其次，这两种理论都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居有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

在上述两种理论的基础上，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亨廷顿提出了第三派学说，即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他的主张集中反映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立论的基础是：第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各国之间的最重大差别不是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政治发达国家政府和政治欠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大。以美、英、苏三国为例。这三个国家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美英是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典范，苏联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原型，但它们的政府都是发达的政府，是统治有效的政府。这三家政府之间的差别，比起它们与任何一组欠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因为，凭其不同形式的政府，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共总书记都能实施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望尘莫及的有效统治。第二，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国家都未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发生相应或同步的进展。非但如此，在这些国家中甚至出现政治混乱，发生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朽”的现象。第三，在第三世界国家，有些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而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丛生。而那些经济起步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兴独立国家，却能享有相当程度的政治

太平。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道路需要重新认真思考。

据此，亨廷顿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作出这样的总体估价，他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第三世界新兴国家，除了若干共产党国家外，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动荡和衰朽的根源并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是它们急剧增长的财富和发展欲望。发展中国家都企图在短时期内全部实现西方早期发达国家在过去长时期内才办完的事情，在政治发展上也同样如此，但是，问题就由此产生。亨廷顿指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英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经历过 1649 年到 1832 年共 183 年的时间，而美国也经历了从 1776 年到 1865 年 89 年的风风雨雨才确立了民主制度。欧洲其他 13 个从拿破仑时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也曾经历过大约 73 年的时间。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 21 个，历时却平均只有 29 年。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的发展，利益集团的分化，资源分配的矛盾，价值观念的冲突，使得民众政治参与期望提高，然而，由于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化的过程比较缓慢，民主政治参与渠道不可能马上完善，超过现有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就有可能引起政治动乱。

亨廷顿认为，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想使第三世界国家避免国内的政治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亨廷顿认为，所谓强大政府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政府活动程序能够获得公认的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它与政治参与一样，也是一个变化的范畴。亨廷顿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随着西方政治价值观念的渗透，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将会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的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党结构、政府制度和立法措施和民族传统规范可以有效抑制民众的政治参与。一个政府强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求得最佳平衡，树立政治权威。在他看来，第三

世界国家之所以存在政治不稳定因素，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和西方政治榜样的压力下，让政治参与跑到了政治制度化前面，结果使政府丧失了权威，损害了自己。亨廷顿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体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政体以及革命政体，并进而对这几种政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克服困难并利用独特的有利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学术界认为，与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相比，亨廷顿的理论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亨廷顿的这本书被认为是研究现代化理论问题的经典之作，书中确实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人们探索出新型现代化道路不无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书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第一，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亨廷顿看来，只有西方早期实现现代化的英美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才是第三世界后起国家民族振兴的参照和归宿。第二，作者在强大政府和独裁统治之间未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为新权威主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第三，作者在论述第三世界现代化中国家的艰难历程时，没有充分论及强权大国对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压迫和干涉以及在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第四，由于政治观点不同，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持有与我们不很相同的看法。第五，作者对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际采取了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亨廷顿看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经济与权威主义政治相伴生的现象，因此得出结论说：权威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至少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而经济的发展也并不会完全带来民主。他根据一项对 98 个国家的细致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在穷国当中，权威主义政体提高了经济发展率，而民主政体则确实像是有碍于经济发展的一种奢侈品。于是，亨廷顿在 1979 年不得不悲哀地说：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承认：发展必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

2. 亨廷顿在理论上的转折

然而，还是这位先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却一反常态，为 20

世纪末期席卷全球范围的民主化浪潮欢欣鼓舞、摇旗呐喊起来。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理论总是现实的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了，人们的理论观点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南欧的民主化过程，宣告了一个新的世界范围民主化浪潮的兴起，也引起西方思想家包括亨廷顿在内的关注和兴趣。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就是受此驱动写成的。

亨廷顿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民主化浪潮”即“波”的概念。亨廷顿认为，所谓政治民主化的“波”，“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这种转型通常发生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而且在同一时期内，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在数量上显然超过向相反方向回归的国家。”^① 亨廷顿还指出，每一波民主化通常也涉及到在那些尚未全面民主化的政治体制中实行的部分自由化或部分民主化。而每一波民主化只影响到数目相对较少的国家，并且在每一波期间都有一些政权朝着非民主的方向运动。亨廷顿提出，“民主化的波浪及其回潮是政治中一种更普遍现象的表现。在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中间不时地或多或少地发生类似的事件。在1848年中，好几个欧洲国家发生了革命。1968年，学生抗议席卷了几大洲的许多国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同国家的军事政变常常集中起来在同一段时间内发生。某十个年头中，民主国家的选举可能向左摆，在下十个年头又向右摆。19世纪民主化长波的播散时间很长，足以把它同后来的民主化浪潮显著地区分开来。不过，每一次回潮都发生在许多较短的时间内。问题是，如何识别像政治中这样波浪式运动的可能原因。”^② 亨廷顿把世界范围内民主化呈现波浪式发展的状况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政治事件发展的单

①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4页。

②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一性。即同一政治事件可能引发多个国家同样的政治后果。二是平行发展性。即不同的国家经济文化水平达到相同的有利于民主出现的水准后，也可引发共同的政治后果。三是示范效应，亨廷顿也将其称之为“滚雪球效应”。即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会引起别的国家的仿效，以至于引起一连串国家同样的政治后果。四是流行性。即在一定时期内流行的政治观念、政治信念对人们的强大影响，从而引起共同的政治后果。关于民主化，亨廷顿也有他独立的看法。他指出民主是一种古老的决策活动机制，“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部落首领数世纪以来一直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在某些地方，民主政治制度长期存在于村一级上。”^①但是，无论原始社会的直接民主，还是古代希腊时期奴隶主阶级的内部民主，都没有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他认为，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是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出现连结在一起的。近代以来的民主同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民主不同，它不仅仅是村庄、部落或城邦的民主，而是国家形态的民主，其出现与民族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西方，迈向民主的最初推动力发生在 17 世纪上半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1638 年 1 月，哈特福德及其邻近城镇的公民所通过《康乃迪格基本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一部成文宪法”。^②但是，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英国的民主制度没有能够彻底表现出来。所以，亨廷顿认为，到 1750 年，西方世界在国家这一级上还没有真正建立民主制度。只是由于美国独立后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制度才真正存在于国家制度之中。从那时起直到 20 世纪末，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这些民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民主化浪潮实现的。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页。

② G. P. Gooch 《17 世纪英国的民主思想》，Newyork, harper, 1959，第 71 页。

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认为，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民主化运动有三次：

第一波民主化是在 1828—1926 年，即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确立时期。他认为，在这一个时期，世界上有 33 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这中间发生了第一次回潮，约有 22 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亨廷顿是这样论述的：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美国大约在 1828 年开始了第一波的民主化。随着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开始向民主化的方向迈进。由于在历史较悠久的东部诸州中废除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加上接纳进来的新州，致使 1828 年美国选举中有选举资格的男性迅速超过了白人男性的 50%。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其他国家也逐渐扩展了选举范围，减少了双重投票，并引入了秘密投票的原则，从而确立了总理（首相）和内阁对议会的责任制度。瑞士、英国的海外领地、法国、大不列颠和几个较小的欧洲国家在跨入 20 世纪之前就已开始向民主过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意大利和阿根廷也建立起了具有民主色彩的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独立的爱尔兰和冰岛成为民主国家，与此同时，俄国和奥地利等国家也开始了民主的进程。20 世纪 30 年代初第一波民主化完全结束之后，西班牙和智利也加入了民主化的行列。在第一波约 100 年的时间内，总共有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最低限度的全国性民主制度。

在第一波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第一次回潮。这种回潮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这个时期，已经建立起的民主制度被威权统治重新取代。这种逆转大部分发生在那些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采纳民主政体的国家。第一次回潮始于欧洲。1922 年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其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和脆弱的民主解体。十年后不久，立陶宛、波兰、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羽毛未满的民主制度也被军事政变所推翻。而像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这样没有搞过民主的国家则建立了更加严厉的独裁统

治。希特勒在 1933 年夺权，终止了德国的民主，把法西斯主义推向极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下，奥地利的民主在四年后垮台。捷克在 1938 年也结束了民主。希腊的民主在 1915 年被全国分立派搅得不得安宁，并最终在 1936 年被埋葬。葡萄牙在 1926 年发生军事政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萨拉查独裁。在美洲，巴西和阿根廷在 1930 年也发生了军事接管，民主政权被废弃。乌拉圭在 1933 年退回到了威权体制。西班牙 1936 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导致了内战，使得民主共和国在 1939 年告终。在亚洲，虽然日本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引入了有限的民主，但最终在 30 年代初被穷兵黩武的军人统治所取代。亨廷顿认为，在第一次回潮中，1910 年之前引进民主制度的十多个国家中，只有希腊在 1920 年之后经历了一次威权主义复辟。而在 1910—1931 年之间引入民主制度的 17 个国家中，只有 4 个在整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维持住了民主制度。在谈及第一次回潮的原因时，亨廷顿认为这些政权的变化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同时，他也不无政治偏见地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是第一次回潮的思想原因，这是缺乏实事求是的。他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在民主制度岿然不动的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反民主的运动从 20 年代的异化和 30 年代的经济萧条中获得了力量。打那场战争本应是使世界的民主更加有保障，结果却释放了左的和右的两种极端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却旨在摧毁民主。”^①非但如此，他对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苏维埃民主政权视而不见，甚至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民主。可见，他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是采取了敌视态度的。

第二次民主化浪潮是在 1943—1962 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约有 40 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而在 1958—1975 年发生了第二次回潮，约有 22 个国家被颠覆。亨廷顿认为第二波短短的民主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 页。

化主要由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盟军的占领促进了西方民主制度在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和韩国的确立。但与此同时亨廷顿却攻击“苏联的压力却扑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初生的民主。”^①按照亨廷顿的描述，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土耳其和希腊开始了民主化。在拉丁美洲，乌拉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到了民主体制，而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则在40年代末期转向民主。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虽然中间经过曲折和反复，但总是建立了有限的和不稳定的民主。而在1960年，非洲最大一个国家尼日利亚也启动了民主的进程。但他同时又指出，在第二波一大批国家中，民主制度极其脆弱：例如，在巴基斯坦，民主制度从来就没站稳脚跟，终于在1958年被正式取缔了。马来西亚是在1957年独立的，除一段短暂的时期外，一直维持了其“伪民主”的状态。印度尼西亚在1950—1957年之间有一种混乱的议会民主体制。在少数几个新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和以色列，民主制度只持续了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亨廷顿认为第二次回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的看法是，20世纪50年代末，政治发展和政权变迁都呈现了极强的威权主义色彩，民主走向低潮。第二次回潮突出表现在拉丁美洲。秘鲁在1962年转向威权主义，而1968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彻底确立了这种威权主义的军人统治。巴西和玻利维亚在1964年也是由军人政变建立威权主义政府的。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分别在1966年和1972年如法炮制，通过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政府。1973年，同样又是由军人接管了乌拉圭和智利的政权。西方政治思想家将这种军人政府体制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在亚洲，巴基斯坦的军人在1958年建立了一个实施军事统治的政权。在50年代末，韩国的民主政

^①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权在 1961 年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一种“半威权主义”政权在 1963 年的选举中得到了合法化，最后在 1973 年终于蜕变成全面的高度威权的体制。在印度尼西亚，1957 年苏加诺用“主导民主”取代了议会民主，而在 1965 年，印度尼西亚的军人则接管了该国的政府。在 1972 年，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实行军事统治。而印度在 1975 年由甘地终止了民主实践，并在印度宣布紧急状态。在地中海地区，希腊的民主政治在 1965 年的“皇家”政变和 1967 年的军事政变之前就已垮台。土耳其则经过反反复复的斗争过程，使军人在 1980 年实行了全面的军事接管。在 1956 年到 1970 年之间，获得独立的 33 个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或是独立后不久就变成了威权国家。非洲的非殖民化导致的是在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独立的威权政府。惟一持续维持民主实践的非洲国家是博茨瓦纳。

在第二波的回潮中，全球性偏离民主化轨道的现象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亨廷顿的说法，有关的一项统计表明，“在 1962 年，世界上有 13 个政府是由政变产生的；到 1975 年，这一数目则达到了 38 个。根据另一项估计，在 1958 年世界上 32 个民主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到 70 年代中期时已变成了威权主义国家。在 1960 年具有伊比利亚传统的南美国家，10 个中有 9 个国家的政府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到 1973 年只有两个，即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正是由于第二次回潮的出现，西方的一些政治思想家包括亨廷顿本人，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对民主化的进程持有悲观主义态度。

第三次民主化的浪潮就是 1974 年从南欧开始的世界民主运动，这次民主化浪潮一直延续到现在。到 1990 年亨廷顿的《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问世之前，世界上有 33 个国家建立了民主，虽然其中有 3 个国家摆了回去，在此后的 15 年中，这一波民主潮流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浪潮；大约有 30 个国家从威权主

①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 页。

义转向了民主政治，至少还另有几十个国家受到了民主潮流的冲击。对此，亨廷顿欢欣鼓舞，充满信心。正因如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看法和观点，在经过一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论。

（三）第三波”民主化的理论内容

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第三波”理论观点。其主要内容是：

1. “第三波”的原因

对于“第三波”的产生的原因，亨廷顿作了如下的分析。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他提出，第三波的出现不是偶然和杂乱无章的。他这样的提出问题：“要回答第三波民主化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大约只有 30 个威权体制国家，而不是约 100 个其他的威权主义国家转向民主政治体制？第二，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权变迁发生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而不是在其他某一段时间？”^①对此，他自己这样作出回答。他认为，在第三波中，上述那些原有的威权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完成向民主化的过渡，是由于这些国家从类型上看，都涵盖了轮回型、二次尝试型、间隔民主型、直接过渡型和非殖民化型这五种民主变迁类型。而在这五种类型的背后，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对“第三波”之所以能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现，他认为，在导致特定的国家在特定的时候出现第三波过渡中有五项这样的变化似乎起着重要的作用：

（1）民主价值普遍被世界接受，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9 页。

深。亨廷顿认为第三波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民主规范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那些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规范的认同。”^① 亨廷顿所谓的“民主规范”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价值观和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模式。他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普遍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取向，使西方的“民主规范”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威权主义政权正在经受剧烈的冲击，使原有的政治合法性发生动摇。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动摇一是表现在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被遗弃，而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政治价值观念正在“被一个第二强大的国家（指前苏联——笔者注）所信仰”。二是表现在其他许多非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的威权主义政权也面临了合法性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以前有过民主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社会的政治体制已经感染了民主的‘病毒’”^②，这些国家对民主信念的迷恋却依然如旧。在这些国家中，威权的统治者被迫用民主的说词来证明其政权的正当性，并声称他们的政权是真正民主的，或是一旦他们能够处理好该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就会在将来变得民主。所以，西方的“民主规范”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

其次，亨廷顿认为，原有威权主义政权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以及军事、经济的一连串失败和1973—1974年以及1978—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这种合法性的削弱，使原有的政治合法性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衰落。他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这一制度的合

①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②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法性是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如果统治者作不出政绩，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而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难免产生政绩困局。因为，在除一党制之外的权威体制下，在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之间都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区分。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威权制度的合法性。一些威权主义国家（主要是军人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人们的不满，促成了政治合法性的丧失。同时，经济的衰败更造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威权政权的危机。亨廷顿指出，许多威权政府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合法性的能力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扬和威权主义政府随后实行的经济政策失败而受到了削弱。1973—1974 年间石油价格的暴涨触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这种状况，连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都受到影响，更是大大削弱了第三世界威权主义政府力图用经济表现和支撑其合法性的努力。而 1979 年的第二次油价上扬加剧了这一局势。连西德、英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执政党都在选举中被逐出局。那么，第三世界威权政府通过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能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期，威权主义政府在对付石油和债务危机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常常使得经济局势更加恶化，造成发展停滞、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债务增加等状况，进一步削弱了威权政权的合法性。

(2) 20 世纪 60 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增长，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标准，促进了教育发展，而且在许多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这是亨廷顿分析“第三波”产生的经济条件。他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是有一定关系的。亨廷顿指出，“如同李普塞在数十年前指出的，有极其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经济发展对民